

张岂之 主编

西部开发与人文学术丛书

北宋新学与理学

萧永明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4.05



本丛书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和
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韦禾毅
封面设计 王晓勇

ISBN 7-224-05561-1



9 787224 055610 >

ISBN 7-224-05561-1/B·151

定价: 12.50 元

总 序

我们在古都西安筹划人文学术研究丛书事宜,正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和起动之际,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促进了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组稿、改稿、定稿等一系列工作。这里所说“鼓励”并不是抽象的,而有着具体实在的思想内容。在我们的理解中,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建设无疑应当是中心课题,而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文化、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和科学中,研究“人”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的思想、人的感情等等被称之为“人文科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经济建设都有内在的紧密联系。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人”创造的,因而对于“人”自身的研究,并使人在精神世界方面感到充实,具有高尚的理想和情趣,并遵奉道德规范等人文科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国西部有不少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就西北地区而言,他们大多集中在西安、兰州,而在敦煌、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地也有人文学者群。西部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基本是在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或文化、文物行政机构工作,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敦煌学、历史地理学、中国思想史、周秦汉唐历史学、中

国考古学、民族史、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已经出版，有些正准备出版。在这样的机缘中，我和一些年轻的人文学者决定组织编辑、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拟分若干辑先后出版。其中既有与西部开发有关的研究内容，也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属于人文科学普遍问题的研究。总之，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是为了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而贡献一点力量。

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出版，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岂之

2000年2月13日于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新学与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学术环境·····	(8)
第一节 宋初社会特点及儒学的时代课题·····	(9)
第二节 宋初的儒学危机·····	(16)
第三节 宋初士人复兴儒学的努力·····	(26)
第四节 新学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37)
第三章 新学与理学为学方法的比较·····	(57)
第一节 新学与理学义理之学的共同特征·····	(57)
第二节 新学与理学的会通与再创造精神·····	(78)
第三节 新学与理学为学规模与次第的比较·····	(98)
第四章 新学与理学社会政治思想的异同·····	(121)
第一节 对先王之道的不同理解与对现实危机的 不同认识·····	(122)
第二节 改革更易的共同要求与指导思想、方法的 差异·····	(134)
第三节 新学、理学的对立与新旧党争 ·····	(157)
第五章 新学与理学本体论构建的特点比较·····	(169)
第一节 佛道之学在本体论上对儒学的挑战·····	(170)
第二节 新学本体论的构建及其特点·····	(176)
第三节 理学本体论的构建及其特点·····	(190)

第四节 新学与理学相互辉映的辩证思维·····	(206)
第六章 新学与理学的不同历史命运及其原因·····	(216)
第一节 新学与理学的不同历史命运·····	(216)
第二节 新学与理学不同历史命运的原因浅析·····	(229)
第七章 结束语·····	(239)
参考文献·····	(241)
后 记·····	(245)

第一章

绪 论

宋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高峰时期。有宋一代,无论文学、哲学、史学、教育、科技、绘画,还是雕版印刷与藏书、对外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的最高水平。本世纪 40 年代初,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近年来,宋史专家邓广铭、漆侠先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②“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总过程中,宋代不仅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而且它的文化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③在宋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是引人注目的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4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 年第 2 期。

③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 年第 1 期。

重要事件。

儒学复兴运动始于唐代中期。当时,韩愈、李翱等儒家学者针对佛道之学炽盛而儒学式微的状况,高扬儒家伦理,力倡儒学道统,排斥佛道之学。宋初以后,范仲淹、欧阳修、李觏、胡瑗、孙复、石介等士人沿着韩愈等所开辟的道路,高举复兴儒学的大旗,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与韩愈等不同的是,宋初儒者在排斥佛道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佛道之学思辨程度较高的长处及儒学自身的理论缺陷,提出了“修其本以胜之”^①的新思路,将注意力转移到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上来。为此,他们疑经惑古、鄙薄汉唐传注而直寻经义、断以己意,在治学方法上有所突破。在此基础上,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苏轼、苏辙等一大批儒家学者,将儒学复兴运动推向了高潮。他们一反传统,抛弃汉唐儒者的章句训诂之学,着重阐发儒家经典之中的义理内涵,形成了新的义理之学的治学方法。与此同时,他们回应佛道之学的挑战,立足于儒学立场而兼取百家之长,构建了新的儒学体系,重新确立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指导地位,改变了长期以来佛道两家声势凌驾于儒学之上的状况。一时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派、以苏氏父子为代表的苏氏蜀学派及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理学派同时并兴,鼎立而三,儒学发展进入了新的兴盛时期。

荆公新学与理学,作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两大儒学学派,它们产生于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学术环境之中,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致之处。然而由于两派学者在气质、个

^①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本论》上,中国书店1986年6月版。

人经历、社会地位、思想渊源等方面的差异,新学与理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有不同的理论特质。两派学者一方面互相辩难、攻击,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尖锐的对立,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互相影响、吸收,其中新学对理学的影响尤其重大^①。在北宋中后期,新学定于一尊,“独行于世者六十年”^②,是居学术界统治地位的学派。南宋以后,新学地位遽然衰落,以至湮没无闻。新学著作亦遭禁毁,到明代后期就已大多散佚不存。而理学虽在北宋处于民间私学的地位,甚至屡受排抑,但在南宋以后,理学得到统治者的尊崇,其理论体系亦经朱熹等理学学者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到元仁宗延祐年间更被定为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明永乐年间,以《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颁行为标志,理学正式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此后,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数百年之中,理学一直占据着思想、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生活习俗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余波至今未已。新学与理学在北宋中期的产生、发展以及其后迥然不同的历史命运,无疑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对于北宋理学的研究,很早就已进行。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朱熹梳理早期理学的源流传承关系,写成了早期理

① 有关荆公新学对理学发展的影响,马振铎先生有较详细的论述,参见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第261~27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

学史著作《伊洛渊源录》。全书内容包括从周敦颐、张载、邵雍至程颢、程颐及其弟子的言行，而尤以二程思想为最详，奉之为理学正宗，突出了理学的道统。《伊洛渊源录》是理学研究的开创之作，它所确立的理学历史统绪，影响了历代学人对于早期理学史的基本看法。《宋史》中“道学”“儒林”两传，就多据此书。明代中后期，理学家周汝登作《圣学宗传》，论列自上古伏羲至明代学者 87 人，以为圣学统绪，其中对北宋理学诸子亦多有论述。明清之际学者孙奇逢作《理学宗传》，列北宋五子及朱熹、陆九渊等共 11 人为理学大宗，论述较详。黄宗羲、全祖望作《宋元学案》，对包括北宋理学在内的宋元时期理学的开创、发展脉络、学术师承及学派传衍等方面作了相当详尽细致的整理、研究工作，代表了封建时代理学的最高水平。上述这些著作，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理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些著作都是立足于理学立场来研究理学，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作者的学术器识也非同一般，却未能对理学进行客观的总结与评价，使人难识理学真面目。其研究方法也仍停留在历史编纂学的水平。

近现代以后，理学研究成为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热点。众多的学者对理学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在人物个案、专题、学派、范畴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理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各种大型的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中都辟有专门章节讨论宋明理学。从整体上研究宋明理学的著作，建国前有吕思勉的《理学纲要》、贾丰臻的《中国理学史》、蒋维乔、杨大膺的《宋明理学纲要》。80 年代以后，更出现了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蒙培元的《理学范畴系统》、陈来的《宋明理学》等从整体上

对理学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力作。其他有关理学研究的专著、论文更是层出不穷、数不胜数。据有关学者统计,仅仅在对二程的专门研究方面,中国大陆自1980年到1996年间,在全国刊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在80篇以上,出版著作6本,其中专著4本,文集2本。港台及海外40多年来也出版著作5本,其中台湾3本,日本2本,另有研究论文80篇以上^①。由此可以略窥理学研究的盛况。

相对于理学研究而言,对新学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南宋以后,大多数儒家学者视新学为异端邪说,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诬蔑。朱熹、王应麟、陈振孙等对新学曾有过简略的评价,但囿于理学正统立场,其总体评价远远谈不上客观、公正。《宋元学案》梳理宋元儒学发展,却将新学摒弃于正文之外,仅设《荆公新学略》,以之与《苏氏蜀学略》附于全书末尾。从章节安排到总体评价,贬落之意非常明显,未能正确反映北宋时期学术发展的真实面貌。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蔡上翔有鉴于“世人积毁荆公,几同于冒骂”^②,作《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考证王安石年谱为线索,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推翻了历代士人对王安石的诬谤之辞。虽然此书目的在于为王安石正名辩诬,但在此过程中亦对新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工作。近代以后,梁启超作《王安石传》等,最早对王安石的学术、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论述,并对荆公新学予以高度评价。现代学者贺麟、钱

① 统计数字见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第391~39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序言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穆等也对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建国以后,新学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辟专章对新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哲学、社会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肯定了新学的历史地位,并对新学学派的著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开辟了新学研究的新天地。其他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也都辟有研究王安石哲学、社会政治思想的专门章节。马振铎则撰作专著《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宋史专家邓广铭、漆侠对王安石有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他们更多次著文,对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及学术特点进行了研究,并指出目前宋代学术研究中重理学、轻新学甚至以理学代替宋代全部学术的倾向,主张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强调新学是宋学中的重要一派,在北宋时期更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必须重视对新学的研究。这些见解,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关新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新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由于南宋后新学著作大多散佚,新学研究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在新学研究中辑佚工作相当重要。清人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周官新义》佚文若干,后钱仪吉又补辑 130 余条,使原书面目得以大致保持。建国后,侯外庐等从黄伦《尚书精义》中辑出《尚书新义》佚文若干条;邱汉生先生钩玄索引,经过 20 余年的努力,将久已散佚于各种史籍之中的《诗经新义》辑出佚文近 2000 条,编为《诗义钩沉》,于 198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容肇祖先生则从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彭耜《道德真经集注》、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等书中辑出部分内容,汇编成《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于 198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辑佚之作,给新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新学研究的发展。

前辈学者在理学与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继续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新学与理学是北宋中期同时并兴而又互相对峙的学派,二者有哪些共同之处?其对立与差异又表现在哪些方面?二者之所以成为不同学派的理论特质是什么?为什么新学在北宋独行于世,到南宋以后却湮没无闻,而理学在北宋地位不高,到南宋以后却骤然兴起?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北宋新学与理学进行比较研究。正如漆侠先生曾经谈到的,对于北宋时期各学派之间的分歧,“学术界几乎还未涉及,还须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①对新学与理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本文希望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史与思想学术发展史相结合的角度,从新学与理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学术环境、治学方法及为学规模与次第、本体论构建的特点、社会政治思想等几个方面对二者的异同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并对二者在南宋以后的不同历史命运做出粗浅的分析,力求在利用现有学术成果的同时又能有所创新与突破,以期对新学与理学的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北宋学术的发展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①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

第二章

新学与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学术环境

宋初,赵宋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与此同时,北宋社会又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局面,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北宋社会的这一特点,给宋代儒学提出了两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首先,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强化伦理纲常与道德名教;其次,解决北宋社会危机,为统治者提供有效的统治方略。但此时,儒学亦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一方面,汉唐以来儒家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拘囿于章句训诂之学,使儒学日益僵化、衰颓,失去了在社会生活中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佛道之学以其理论思辨水平较高的优势对儒学进行挑战,使儒家的纲常伦理受到很大的威胁。宋初人士围绕北宋的时代课题,针对儒学的危机,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们一方面排抑佛老、攘斥异端;一方面疑经惑古,更新儒学。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佛道之学在理论思维方面的长处及儒学自身的局限,提出了“修其本以胜之”的思路,注重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并且在治学方法上开始走向了对传统汉学的反动,注重阐发儒家经典所涵蕴的义理。正是在此基础上,新的儒学学派——荆公新

学与理学产生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学者及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理学学者沿着宋初人士开辟的道路,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儒学学派,将儒学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节 宋初社会特点及儒学的时代课题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赵宋王朝。这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割据、战乱纷争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政权。赵宋王朝降生时的这种历史特点,给宋初政治以深刻的影响。

唐中叶以后,中央集权逐渐受到破坏,藩镇势力日益膨胀,割据日益严重,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并最终导致了李唐王朝的灭亡。五代十国时期,干戈不息,各方割据称雄,致使封建王朝急剧更替。在短短的53年内,就历五朝八姓十三君。享祚之短暂,更替之频繁,都是前所未有的。赵宋立国之后,战乱频仍、易姓改号的历史事实还刚刚过去,如何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唐末五代覆辙,必然成为统治者处心积虑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他们反思五代历史,认识到当时祸乱连绵,帝王八易其姓,根本原因就在于方镇权重,君弱臣强。据史料记载,在北宋王朝建立伊始,赵匡胤便与宰相赵普谋画长久统治之计:“帝……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如何?’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兵权,制其钱谷,收其精

兵，则天下自安矣’。”^①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宋太宗也曾对赵普说：“五代承唐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②应该说，宋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将唐末五代之乱归因为藩镇跋扈、君弱臣强，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的。

基于这种认识，北宋王朝从赵匡胤开始，就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针对五代的藩镇割据，宋初政府将州郡长官的政治、财政、军事大权收归中央，最后又集中于皇帝，从而大大削弱了州郡实力，使地方政府不可能与中央政府对抗，以杜绝藩镇割据现象再度发生。正如后来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齐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③

为了防止权臣的篡夺，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上，皇帝控制了全部的军事、财政、行政权力。在军事方面，收夺了高级将领的兵权，设置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使之互相牵制，最后由枢密院统领，而枢密院又由皇帝控制。枢密院的设立，使宰相无权统兵。而同时枢密使与握有重兵的将领之间又是互相牵制的。将领有握兵之重而无制令之权，枢密使有制令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兵权牢牢控制于皇帝一人之手。在财政经济方面，设置三司，三司使号为计相，独立于宰相。使宰相不能掌管财政。宰相既无兵权，又无财权，对国家大事所起的作用也就极为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七月。（以下简称《长编》）

② 李焘：《长编》卷二十九，太宗端拱元年十二月。

③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有限,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力集中于皇帝。宋初统治者通过这种叠床架屋式的机构设置,“事为之防,曲为之制”^①,使文臣武将、各类机构互相制约,由皇帝掌握全部大权,“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②,形成了宋初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当时的情形,确如南宋吕中所谓“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③近代学者柳诒徵先生纵论中国历史,曾对宋代中央集权予以较高的评价:“自汉以来,君主政体无所变革,然政治之中心,往往不在君主本身,而旁及于女主、外戚、宦寺、嬖幸、宗王、强藩之手。有宋尽革其弊,虽间有女主垂帘,宦官得势之时,要皆视两汉、晋、唐为不侔。”^④

宋初君主的高度集权措施,的确遏制了分裂势力的膨胀,消除了瓦解统一的诸多隐患,有效地防范了唐末五代种种弊病的重演,但是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是很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冗官冗兵现象的产生和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宋初统治者为了达到集权于皇帝一身的目的,设置了众多的互相牵制的官僚机构。庞大的机构需要补充大量的官员,于是科举取士的名额迅速扩大。宋太祖在位时,科举取士的人数一般每次仅十余人到30余人,多者60余人,少则仅数人。但太宗时的八次科举考试取士,少则144人,多则1317人,总数达5814人。这使得官僚队伍变得十分臃肿庞大,据有关学者统

① 李焘:《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十月乙卯条。

② 叶适:《水心别集(十),始议二》。

③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收兵权》,中华书局1977年5月版。

④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16页。